

的，就像說汽車是個好東西，因為汽車比馬車跑得快，誰都懂這個道理，但我們還要瞭解道路的狀況，汽車就沒法開在泥濘的小路上。另外，比汽車跑得更快的交通工具還有很多，如高鐵、磁懸浮、飛機等，人類還會有新的創新。所以，與其說民主是個好東西，還不如說「好民主才是好東西」。也有人會說，這樣會使問題複雜化，比方說，我們可以講社會主義是個好東西，那麼你是否也可以說好社會主義才是好東西。其實，問題沒有那麼複雜，因為民主這個概念，已經被西方先註冊了，西方幾乎掌握了定義權，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突破西方話語對民主這個概念的壟斷，使我們有必要加上一個形容詞，才能把事情說得更清楚。

我還要指出，隨著西方民主自身危機的加深，愈來愈多的西方有識之士意識到了西方政治模式的困境。二〇一〇至二〇一一年，比利時經歷了五百多天無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機，之後比利時的一批知識份子於二〇一一年十一月發表了《千人集團宣言》，並在宣言中非常直白地指出：「除了民主，現在全世界的革新無處不在。比如公司必須不斷創新，科學家必須不斷跨越學科藩籬，運動員必須不斷打破世界紀錄，藝術家必須不斷推陳出新。但說到社會政治組織形式，我們顯然仍滿足於一八三〇年代的程序。我們為什麼必須死抱著兩百年的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活著的有機體，民主的形式並非固定不變，應該隨著時代的需要而不斷成長。」

總之，西方許多有頭腦的哲人對民主制度作過很多認真的思考。不管他們的意識形態傾向如何，他們對民主的思考水準，從總體上看，遠遠高於今天那些在全世界到處推行「民主原教旨主義」的人。



西方人權話語的缺陷

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解決了「挨打」的問題，改革開放解決了「挨餓」的問題，現在我們要解決「挨罵」的問題。西方以及受西方勢力影響的很多人天天在罵中國，毛澤東曾說過，帝國主義是如此地欺負我們，這是需要認真對待的。

在人權問題上，西方已經習慣於當全世界的法官，喜歡教訓別人。其實，西方的人權觀，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存在大量的問題，一點就破。西方對中國妖魔化的一個論調就是，不管中國取得什麼樣的成就，它都要質疑：為什麼中國人權狀況每下愈況。

我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西方人權話語的回應不夠強勢。我們經常用的話語是：我們還是一個開發中國家，對於我們來說，生存權和發展權是最重要的。這樣的話語有道理，但我個人認為還不夠透徹和強勢，或多或少留了一個口子：我還沒有發展到你的水準，還不能採用你現在的標準，所以西方可以繼續維持自己的道德制高點，可以隨時敲打我。我個人認為，在人權問題上我們首先就是要非常自信地剝奪西方的道德制高點。

對於西方無端的人權指控，我有幾個回答在很多國際場合都用過，效果不錯。二〇一七年，我參加了在荷蘭舉行的奈克薩斯思想者大會，西方學者劈頭就質疑中國人權問題，我說中國今天每年出境的人數已經達一億兩千萬人次，百分之九十九·九九都回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

為什麼回到一個照你們說沒有人權的地方？為什麼回到一個照你們說人權每況愈下的地方，這是不可能的，情況一定是恰恰相反，中國一定是世界上人權進步最快的地方，人民對自己和對國家前途最樂觀的地方。這是個常識判斷，如果這一點都不承認的話，那我們還怎麼交流？

如果是美國人質疑中國人權問題，你可以告訴他，二十一世紀對人權最大的侵犯就是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超過十幾萬的平民無辜死去，數百萬人無家可歸；你可以告訴他，如果美國不就一直自己侵犯伊拉克人權的情況作出解釋和道歉，怎麼有資格來和中國談論人權？

你還可以告訴他們一個如何看待人權的方法，就是一定首先要問這個國家的人民，而不是問美國人和歐洲人。我認為談論中國人權的好壞，應該先問無論在中國境內還是在境外的中國人，中國人權是好還是壞；你也可以查一查西方有信譽的民調機構，如美國的皮尤研究中心、法國的益普索等過去五年到十年在中國做的民調。這些民調幾乎都證明，中國人是對自己國家前途最樂觀的，絕大多數中國人認為自己的國家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有一個很大的差別。中國人常說，三人行，必有我師；西方人似乎更相信三人行，我必為師。因此，對於中國，西方甚至要十三億人行，他必為師。這就太傲慢和無知了。

這種傲慢和無知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很多西方人總認為自己最瞭解這個世界。他們認為自己比非洲人更瞭解非洲，比俄羅斯人更瞭解俄羅斯，比中國人更瞭解中國。我去過不少非洲國家，西方總認為非洲的民主化必須是壓倒一切的，但至少應該問一問非洲人自己是怎麼考慮的。從我所瞭解的情況來看，非洲人最想解決的人權問題首先是吃飯問題、就業問題、治安問題、



消除疾病問題，但西方硬要把民主化放在第一位，結果使多少非洲國家陷入了動亂和饑荒？

中國現在積極在非洲推動「一帶一路」，西方則質疑中國為什麼不對一些所謂非洲獨裁國家進行制裁。這就涉及一個理念上的巨大差別。從中國人的理念來看，消除貧困本身就是一項核心人權，幫助非洲國家脫貧就是在實現一項核心人權，任何國家都不能找任何藉口來阻礙這項人權的落實。這就像國際紅十字會的人道主義救援活動，它是不分敵我的，而是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進行的。如果要制裁一個國家，那需要通過聯合國授權來共同進行，而不能只是幾個西方國家說了算。西方在非洲什麼都按照自己的標準行事，成了一種政治勒索，受援國家怎麼可能發展起來？這也是為什麼愈來愈多的非洲國家把目光投向中國，他們的說法叫作「向東看」（Looking East）。

西方之所以老是盯著中國人權問題不放，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習慣了「西方中心論」和「歷史終結論」的邏輯，認為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做法，才能代表人類最好的制度和做法。你跟我不一樣，你就不文明。對於這種傲慢，我們必須給予迎頭痛擊。

西方人權話語體系，從表面上看，頭頭是道，其實存在著一些基本缺陷。下面我把西方人權話語體系的主要缺陷略作簡單的分析：

第一，我們今天講人權，如果採用聯合國的人權標準的話，一般有第一代人權，也就是政治、公民權利；第二代人權，一般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還有第三代人權，如環境權利等。西方人權體系的缺陷是在不同的人權之間缺少一種平衡。西方一般強調的主要是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比如美國這樣的西方國家，到現在連第二代人權，即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都不承認。美

國是世界上參加國際人權公約最少的國家之一。聯合國共有九個核心國際人權公約，美國有六個沒有參加——《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以及《兒童權利公約》。

美國現在還有超過兩千八百萬人口沒有參加醫療保險，這其中包括不少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美國婦女沒有帶薪產假。這些都屬於違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當然美國沒有參加這個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西方國家幾乎迄今為止都沒有做到男女同工同酬，這也是違反《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精神的。有一次一位英國女學者向我質疑中國的人權問題，我說：妳最好首先關心一下妳自己的人權，關心一下妳自己和貴國的女同胞什麼時候能夠實現男女同工同酬，這是違背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第一款的。美國的問題則更為嚴重。從美國總統川普的競選開始直到今天，美國的種族矛盾、族裔矛盾、種族歧視等問題，按照聯合國標準，都涉及基本人權的問題。川普總統就職後，美國各種右翼的活動明顯上升。二〇一七年美國的仇恨犯罪（hate crimes）數量上升了百分之十七，所謂仇恨犯罪就是基於種族、膚色、民族等的犯罪行為。



第二，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關係的困境。西方強調人權是個人的權利，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他們擔心集體權利會被濫用，成為損害個人權利的藉口。但這種擔心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因為個人權利的濫用也會導致集體權利的損害。比方說，一位法國漫畫家和一位丹麥漫畫家以個人的言論自由權，挑釁十多億穆斯林，褻瀆伊斯蘭教「先知」。一個理想的人權保護體系應該兼顧個人和集體權利，兼顧自由與責任。權利與義務之間應該有一種平衡，在這方面，我認為，中國人強調權利與義務平衡的哲學理念將更適應全球化時代人權發展的趨勢。

第三是一個國家有沒有權利根據自己的國情選擇推動人權的優先順序。西方認為沒有，這是荒謬的。其實，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同時實現所有的人權。西方在開發中國家推動人權的方法幾乎都是政治權力壓倒一切。這麼多開發中國家在西方的指導下，嘗試了政治權優先，而不是消除貧困優先，結果很糟糕。在一個充滿貧困的國度裡，按西方的邏輯去推動人權，結果就出現了伊拉克、阿富汗這樣的「爛民主」：缺少基本的社會秩序，幾乎每天都發生各種爆炸案。

其實，實現人權應該有輕重緩急。中國人沒有按照西方的邏輯去做，中國把消除貧困作為核心人權，在短短四十年內實現了七億四千萬人口的脫貧，創造了世界最大的中產階層。如果按照西方的標準做，消除貧困根本就不是人權，畢竟美國至今連經濟、社會、文化權利都不承認。所以我們不等西方覺醒了，就這樣做了，總體效果非常之好。這對整個開發中國家都是一個巨大的鼓舞和啟迪，因為開發中國家的最大問題就是消除貧困。無疑，會有愈來愈多的非西方國家希望借鑑中國的扶貧經驗。

第四個缺陷是法條主義問題。西方把人權問題基本上都看成是法律問題，認為只有法庭可以

受理的人權問題才能算人權問題，這在法制不健全、律師力量不足的開發中國家很難操作，代價也非常昂貴。我個人認為，從中國的經驗來看，促進人權最好的辦法是在推動法治建設的同時，通過政治手段來促進人權，這樣做更容易取得成效，這是中國促進人權的一條重要經驗。

當然在討論人權時，我們也要指出，有些人權屬於核心人權，是人類社會應該接受的共同底線，比方說禁止酷刑和奴役制度、人有思想的自由、人不能被隨意逮捕等。在這些問題上，中國和世界上多數國家的主流觀點沒有分歧。美國對關塔那摩監獄（Guantanamo Bay detention camp）的犯人實行了酷刑，引起整個世界的反感，就是因為這些做法觸犯了人類文明的共同底線。

還有一個問題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與人權的關係，這關乎人權機制或者體系下一步應如何發展。國內曾經有過一個小小的爭議，有一首歌在十多年前非常流行，叫作〈常回家看看〉。歌詞是「陪同愛人常回家看看，媽媽準備了一些嘮叨，爸爸張羅了一桌好飯，生活的煩惱跟媽媽說說，工作的事情跟爸爸談談」，這首歌當時一下子就在整個中國流行起來了。一些女權主義者認為這首歌歧視了婦女，但大多數中國人不這麼認為。他們認為現代化進程導致了生活的過份忙碌，但再忙我們也不應該忘記自己的父母。這首歌唱出了中國人的文化傳承，這是一種溫馨的人文傳統。

每一個社會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人的文化傳統比西方人權理念的出現要早得多。世界上的事情不能什麼都套用西方形成的人權標準。世界人權事業的未來方向應該是更多地包容不同的文化和智慧，從而豐富人權的理念。我們要防範那種把自己的文化說成是「普世價值」、把別人的文化說成是落後習俗，然後把自己的東西強加於人的做法。



今天國際政治中的一個新問題是中東難民湧入歐洲的問題，它也和人權有關，它反映出整個西方人權機制面臨著巨大的困境。西方國家支持「阿拉伯之春」，但很快就變成了「阿拉伯之冬」，利比亞陷入無政府狀態，葉門同時進行著三四場戰爭，這樣一個小國，連兩千萬人口都不到，同時進行著部落的戰爭、族裔的戰爭、宗教的戰爭，還有南北方圍繞國家統一還是分裂的戰爭。同樣悲慘的還有敘利亞，十五年前我曾去過敘利亞，當時那裡可以算是一個比較和平繁榮的國家，大概有中國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的水準。但今天這個國家一半的人口成了難民，主要城市都成了殘垣斷壁。我對西方人說，你們是在這些國家造孽！把伊拉克搞亂了，把利比亞搞亂了，把敘利亞搞亂了，其實這些國家過去都不窮，有的甚至相當富裕，他們過去的人均 GDP 都高於中國，現在幾乎變成了人間地獄。但西方現在還企圖搞亂中國，對於這種企圖，我們要給予迎頭痛擊。

所以我跟歐洲人說：「阿拉伯之春」爆發的時候，你們是一片歡呼聲，但過去的這些年，我們看到這個地區充滿了混亂和戰亂，已經有一百多萬難民流入歐洲，還有更多的難民在路上，這已經把歐洲政壇攪得昏天黑地，今天歐洲的主要問題幾乎都和難民危機有關。這背後所展現的人權困境，即西方當初推動「阿拉伯之春」，顯然不符合當地的民情與國情，結果是嚴重的水土不服，導致全面打破了當地過去一些非常微妙的族裔的、宗教的平衡，變成了內戰。

而在難民來到歐洲之後，西方人的很多行動和言論，也都是違反人權的。歐盟國家都簽署了聯合國《難民公約》，這個公約有一個重要條款，叫「non-refoulement」，這是一個法文單詞，在英文中也這樣用，就是不能推拒的意思。也就是說，難民如果你的國家申請避難的時候，你

不能推拒，而是要甄別他是不是難民，但現在你連這個都做不到，而是派重兵把守邊界，攔上鐵絲網，全部拒絕在外，這就違反了你們簽署的《聯合國難民公約》。歐洲的民主國家，當初幾乎都是積極推動「阿拉伯之春」的，有的甚至是直接進行軍事干預的國家，像英國和法國則是帶頭進行軍事干預的國家，今天闖了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難民湧到了家門口，全都不接收，連甄別程序都不給人家。這些難民，在本國許多都是中產階層，但國家完了，他們的一切也完了，這就是中國人講的「國破家亡」。中國人過去經歷的太多了，這就是為什麼多數中國人把國家的命運看得很重，也是為什麼中國人痛恨西方搞亂中國的圖謀，痛恨那些幫助西方搞亂中國的「帶路黨」。

現在歐洲內部困難重重，經濟情況也不好。而西方國家的制度，只對自己國民負責，現在經濟不好自顧不暇，哪有精力和資源來照顧湧入的難民。所以我跟歐洲人也說，你們老是搞人權外交，但歐洲內部各個領導人的說法都不同，德國總理梅克爾是一種說法；英國前任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是另外一種說法，卡麥隆早就說過英國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經失敗；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án）又是一種說法，歐爾班非常明確地拒絕歐盟分攤難民安置的計畫。你歐洲內部都沒有達成關於人權的共識，又怎麼好意思向全世界推動人權外交呢？

所以，我從總體上認為，中國已經到了這麼一個階段，中國人自己也可以把人權問題說得清清楚楚，特別是從中國人的視角，把西方的人權問題，把世界的人權問題，把西方推動所謂人權外交所造成的各種人權問題，都說得清清楚楚。這也是今天我們解決「挨罵」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



「整體利益黨」還是「部份利益黨」？這才是關鍵

近些年，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原因是西方自己長期地誤讀中國，誤讀中國共產黨。直到二〇一二年，西方主流政治觀察家還認為中國要崩潰。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我在英國廣播公司接受採訪，主持人問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覺得中共還會有「十九大」嗎？我當時笑了，我說，過去這麼多年，你們對中國的政治預測，哪一次是對的？我一個人的預測都比你們預測得準。西方主流政治學者、主流媒體人、主流智庫，他們的指導思想還是「西方中心論」和「歷史終結論」，只要中國的做法和西方的做法不一樣，中國就不對，就要走衰，甚至要崩潰。

但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我們不必等西方覺醒，我們要大踏步地邁向世界經濟和政治舞台的中央。而他們的學者、他們的智庫、他們的媒體、他們的政客大都還沒有做好準備。

於是就出現了美國今天的極端焦慮、不知所措、進退失據。一會兒關閉孔子學院，一會兒吊銷中國學者的簽證，一會兒宣稱中美之間是不同種族的競爭，還有人要和中國經濟「脫鉤」。川普總統甚至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以防範外國公司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坦率地講，中國一家公司可以讓美國總統宣佈整個美利堅合眾國都進入緊急狀態，這本身不就很震撼嗎？現在變成我們要提醒美國：你要自信，你還是超級大國，沒有人要奪你的權。但美國人不信，總覺得中國正在

動搖他們的一切，而中國沒有這個意圖。

其實，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對中國的誤讀由來已久。大家如果關注時政，一定知道西方主流媒體，一旦涉及中國政治和政黨，提出的問題總是那麼幾個：「為什麼中國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沒有政治改革，中國怎麼能成功？」、「中國什麼時候放棄一黨制？」，等等，我把這叫作「懶漢做學問」、「懶漢做媒體」，靠一個它自己界定的所謂「普世價值」，不需要做調查研究、不需要瞭解不同國家的文化和歷史傳統，只簡單根據你跟我不一樣，就認定你是落後的。這真是「武大郎開店，比我高的不要」，正是這種心態導致西方制度日益僵化，社會菁英不思進取、不思改革，結果只能是「黑天鵝現象」層出不窮，人民愈來愈失望。

現在是我們經常跟美國人說：你要自信一點，如果「四個自信」做不到，就做到「一個自信」吧。「一個自信」就是交流自信，現在連正常的學術交流和文化交流都害怕，哪裡還有一個大國的氣度呢？

西方讀不懂中國政治制度，尤其讀不懂中國共產黨，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這很大程度上源於西方長期以來的意識形態偏見，也源於在西方經驗基礎上所形成的西方社會科學的偏見。隨著中國的崛起，整個外部世界希望瞭解中國共產黨的願望愈來愈強。今天到歐洲或者非洲舉辦一個談中國共產黨的講座，聽眾會趨之若鶩，當然前提是要講得好，講得人家能夠聽懂。美國也是一樣，只是最近美國的極右勢力對中國的迅速崛起是真的害怕了，他們正在掀起一股「反華反共」的逆流，愈來愈像二十世紀五〇年代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美國號稱有學術自由，但今天能夠頂住這股逆流的學術機構還真不多，這也有助於我們瞭解美國真正的政治生態和學術生



態，當然這一切最終的最大受害者將是美國自己。受西方話語的影響，許多人讀不懂中國共產黨。其實，我們可以用大家都能夠聽懂的語言，把中國共產黨講得清清楚楚。

首先，中國共產黨雖然名字叫「黨」，但和西方政黨的「黨」的含義完全不同。大家知道英文中，黨這個詞叫「party」，法文叫「parti」，西班牙文叫「partido」，詞根都是「part」，也就是「部份」的意思。所以西方的政黨理論，說簡單也很簡單，就是一個社會由不同的利益團體組成，每個團體都要有自己的代表，也就是一部份利益的代表。在某種意義上，這就是多黨制的起源。所以西方的政黨是公開的「部份利益黨」，然後不同「部份利益黨」通過競選和票決制對執政地位進行競爭：你得百分之五十一的選票，我得百分之四十九的選票，你就贏了，我就輸了。理論上，一個多元的社會，在遵守法制的前提下，可以這樣通過票決制，先是「分」，然後走向「合」。如果有爭議，由最高法院裁決，大家不同意也要同意。

但非西方社會採用西方模式之所以頻頻失敗，一個重要原因是一旦社會這樣「分」了之後，就再也「合」不起來，最高法院的裁決也沒有用。其實，今天西方社會也面臨著同樣的挑戰。美國現在就「合」不起來，一個川普，把整個美國社會深深分裂了；英國也是這樣，一個脫歐公投，把整個英國社會深深分裂了。

與西方「部份利益黨」截然不同，中國共產黨是「整體利益黨」，背後是中國自己源遠流長的政治傳統。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文明型國家」的一個特點是「百國之和」，也就是說，中國是在自己漫長的歷史中，由成百上千個國家慢慢整合起來的。這樣的國家自然有自己的政治傳統，就是統一的執政集團。如果中國也採用西方這種「部份利益黨」模式，那麼中國馬上

就會出現幾百個乃至上千個政黨，上海黨、天津黨、石家莊黨、哈爾濱黨、湖北黨、江西黨，然後就是國家分裂、內戰爆發，無數生靈塗炭。這就是為什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中國採用「部份利益黨」模式後，最終導致軍閥混戰、國家四分五裂，而且每個軍閥背後還有不同西方國家的支持，這是最深刻的政治教訓。

我跟歐洲人說，我可以給你一個不準確但可以帶來一定啟發的比喻。我說，中國這樣的國家，有點像歐洲的古羅馬帝國沒有滅亡而延續至今，而且已經變成一個超大型的現代國家，內部包含了巨大的區域和文化差異，但這個國家擁有統一的中央政府、擁有現代經濟，人民使用統一的語言，同時也使用上千種不同的方言。這樣的國家如果採用西方這種對抗性的「部份利益黨」模式，將會變得無法治理而解體。我們還可以再做一個假設，如果今天歐盟的版圖就是古羅馬帝國延續至今的版圖的話，那麼歐盟的人口也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如果今天的歐盟也採用多黨制一人一票來選舉歐盟的最高領導人，那麼歐盟要麼走向解體，要麼變成沒有任何實質性作用的空架子。

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決定了如果中國的執政黨，也像西方政黨那樣只代表部份人的利益，那麼這個政黨終將被人民拋棄。中國歷史上的各個執政集團，也都想代表人民的整體利益，但這並不容易，然而即使不能代表，它也一定要宣佈自己代表「天下蒼生」。像西方政黨那樣，公開代表部份人利益，在中國政治文化裡是行不通的。以上我是從「文明型國家」的角度、從中國歷史傳承的角度，對中國共產黨的傳統基因的探討。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更重要的還有紅色基因。《中國共產黨黨章》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中國共產黨是建國黨，它是通過長達二十八年艱苦卓絕的鬥爭，犧牲了上百萬共產黨人的生命，才換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毛澤東曾說：「成千上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這使我想起了已故作家李敖生前對台獨份子的嘲笑，他說：你們是蠢種，是一批沒有信仰的人。信仰就是為了事業，敢於拋頭顱灑熱血。李敖坐過國民黨的牢，也研究過國民黨在台灣白色恐怖期間辦過的近三萬個案子，他發現那些把牢底坐穿的，那些拋頭顱灑熱血的，那些橫屍法場的，都是共產黨人。在這麼多案子中，他發現只有一個是「台獨」份子，他被槍斃了，但後來發現他還是個精神病患者。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自己的民族獨立，付出了百倍於美國人為美國獨立所付出的代價，所以我們當然珍惜我們來之不易的民族獨立，珍惜我們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珍惜我們來之不易的成功之路，我們當然堅定地拒絕和粉碎任何「顏色革命」的企圖。

除了傳統基因、紅色基因之外，中國共產黨還有大量的現代元素。中國共產黨具有全世界最明確的現代化導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從毛澤東創立了一整套政治制度安排，到鄧小平的「三步走」戰略，到習近平提出的「兩個百年」宏偉藍圖，都是為了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共產黨的決策機制包括廣泛的協商民主和「新型的民主集中



制」，這種「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決策機制，能夠較好地統籌不同利益團體的訴求，實現人民整體和長遠利益的最大化。中國政治制度的戰略規劃和實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強的。一個接一個五年計畫的順利制定和執行就是很好的例子。西方人經常感嘆，西方的公司都有短、中、長期的規劃，但西方國家都沒有這樣的規劃。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西方多黨制決定了一個政黨所制定的規劃換了一個政黨來執政，就往往難以延續了。台灣地區在所謂的「民主化」之前還有六年規劃，當年的經濟起飛離不開這樣的規劃，但「民主化」之後就無法制定這樣的規劃了。一個國家和社會究竟是有規劃好，還是沒有規劃好？當然是有規劃好。中國今天已經形成了「謀定而後動」的共識，從國際實踐的比較來看，中國民主決策的總體質量明顯高於西方。在美國，一個重要的決策，如奧巴馬的醫療改革，往往是極小圈子裡做出的決定，然後與各種利益團體討價還價，最後形成的東西冗長繁瑣，執行力很差，還得靠一批公關公司向公眾「出售」（sell to the public），而換了個川普總統，又把它全部推翻，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決策體制下是不可思議的。

在組織制度方面，我們總體上實行的是「選賢任能」。如前所述，源於持續了上千年的科舉制等人才選拔制度，源於中國人「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的政治文化，也融入了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做法，如民調和選舉等，總體上已經形成了「選拔+選舉」的制度安排。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大都經歷過廣泛的基層鍛鍊和各種崗位的歷練，治理過超大規模的人口和超複雜的不同部門，積累了大量治國理政的經驗，因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的總體素質要明顯高於西方模式所產生的政黨領導人。當然這個制度還在不斷完善之中，還有很多改進的空間，但與



西方光靠「選舉」的制度相比，明顯勝出，而且前景看好。

過去三十多年，我們看到了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崩潰；我們看到了一場又一場「顏色革命」褪色後留下的經濟凋敝、政治混亂和社會分裂；我們看到了「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許多過去還算和平繁榮的國度被西方勢力推入了族群互相殺戮的戰場；我們也看到西方及其模式整體走衰的大勢，西方國家紛紛陷入嚴重的金融危機、財政危機和政治危機而難以自拔。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迅速而全面的崛起，人民生活水準跨越式的提高，中國加快了邁向世界經濟和政治舞台中心的步伐。這是一張非常亮麗的成績單，世界上還有哪個政黨拿得出來？

我們現在反覆說，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英文中的說法就是「the institution」——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所以把黨建設好，是我們事業成功的關鍵所在，否則中國就可能落到一盤散沙甚至四分五裂的境地。面對各種前所未有的挑戰和任務，我們一定要堅持「黨要管黨」，在這個過程中解決黨自身存在的各種問題，實現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確保黨始終成為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競爭日益激烈，而其中政治制度的競爭無疑是一個關鍵。我認為在這場競爭中有三條標準特別重要，這也可以說是中國的政治標準。

一是看一個國家有沒有一個能夠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如果這個國家有這樣的力量，勝出的可能性就比較大；如果沒有，走衰的可能性就比較大。坦率地說，中國有，就是中國共產黨，而美國已經沒有了。

第四章

中國定力： 中國人，你要自信



二是看一個國家是否有足夠的改革能力。中國需要改革，美國需要改革，歐洲國家需要改革，但我認為迄今為止似乎只有中國能夠推動真正的改革。為什麼？因為改革是要破除既得利益的，所以改革需要能夠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來推動，否則改革必然被各種既得利益者阻攔而寸步難行，就像美國連禁槍都做不到，因為這背後有代表槍枝和軍工利益的利益集團。

三是看一個國家的決策力和執行力。中國共產黨採用協商民主和民主集中的方法進行決策，其決策力和決策質量總體上明顯高於西方國家的小圈子決策、遊說集團決策和民粹主義決策模式。我們決策的執行力也是世界公認的。

這三條標準也是一種中國話語，我們可以用它去評判和衡量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政黨和政治制度，從而更加堅定我們自己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